

近代中国人物

《近代史研究》专刊



JIN DAI ZHONG GUO REN WU

目 录

瞿秋白思想研究	丁守和 王凌云(1)
王若飞的思想发展	马连儒 袁钟秀(90)
肖楚女政治思想评述	范春荣 宋士堂 夏良才(124)
恽代英年谱简编	雍桂良 张 羽 姚维斗(157)
彭湃年谱	吴家林 袁钟秀(187)
宋庆龄的思想发展和革命实践	宗志文(216)
谭平山历史上几个问题的探讨	元邦建(243)
邓演达思想试探	丘 挺(282)
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汪精卫	黄美真 张 云(312)
论二十年代胡适的世界观	袁伟时(328)
康有为与今文经学	汤志钧(351)
梁启超在清末的政治宣传	耿云志(366)
论宋教仁	习五一(412)
论《天义报》刘师培等人的无政府主义	杨天石 王学庄(448)
论刘师复	张 磊 余炎光(478)

瞿秋白思想研究

丁守和 王凌云

翻开中国的近代史，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是中国风云变幻，光明与黑暗激烈斗争的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掀起翻天巨浪，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瞿秋白同志就是这个队伍里的一员，而且是重要的一员。社会的刺激，时代的召唤，斗争的要求，使那时英杰辈出，群星灿烂。在这灿烂的群星中，瞿秋白的思想理论观点，显得颇为光彩耀眼。

瞿秋白同志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战士，我们党早期的卓越领导人。他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是第一个直接系统报道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和劳农国家状况的中国人。他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国情，探讨和阐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在革命危机和困难关头，他和其他同志一起力挽狂澜，拨正船航，继续前进。在受到残酷打击后，他又发动领导无产阶级文化运动。他犯过错误，但决不讳疾忌医，而是努力改正。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瞿秋白同志的遗著很多，包括政治、理论、文学译作，总数在四百万字以上，其中虽然也有不妥之作，但这是烈士的遗产，思想史上的丰碑。研究瞿秋白的思想（包括某些错误思想），对于我们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继承党的革命传统，吸取有益的教训，更

好地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都是有益的。

一、为大家开辟一条光明的路

瞿秋白1899年1月即戊戌年十二月生于江苏常州。那正是中国的民族危机、社会危机极其严重的时候。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变法维新失败了，继起的义和团运动也惨遭镇压。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深入，腐败的清政府对外投降卖国，对内残害人民。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统治，使人民遭到极大灾难。中国社会的矛盾继续加深着。瞿秋白就是在这严重的内忧外患环境里成长的，因而在他青年时代便萌发了强烈的爱国思想和变革社会的愿望。他在黑暗中徘徊，探索着出路，然而什么是国家和个人的出路，他一时又弄不清楚。

瞿秋白出身于没落的世家，即所谓“士的阶级”。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固有的经济基础已经动摇破裂，这种“士的阶级”也破产了。他曾说过，他的诞生地，就在这颠危簸荡的社会组织中破产的“士的阶级”之一家族里。这种畸形的社会地位，濒于破产死灭的一种病体状态，同他心灵“内的要求”即个性发展，绝相矛盾。于是痛，苦，愁，惨，与其生以俱来。他的家世类似鲁迅，但更惨，母亲已为“穷”所逼杀，父亲也只是“穷”的遗物。依人的生涯，使他处于类乎游民无产者之地位。虽说有家族的维系，亲戚相维持，免以为生，也不过如万丈波涛中的破船，名曰是同舟共济人，仅只能有牵衣悲泣的哀情，抱头痛哭的下策。“那垂死的家族制之苦痛，在几度的回光返照的时候，映射在我心里，影响于我生活，成一不可灭的影像，洞穿我的心胸，震颤我的肺肝，积一深沉的声浪，在这蜃楼海市的社会里；不久且穿透了万重疑

网反射出一心苗的光焰来。”^①他忧虑，思索，透过万重疑网，萌发着变革社会的心愿。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思想的变动，一九一一年革命的爆发，都证明旧中国社会的破产。然而这个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革命，“只赚着一舆台奴婢匪徒寇盗的独裁制”。“自由”、“平等”、“民权”的口头禅，在大多数社会思想里，即使不生复古的反动思潮，也就为人所厌闻，一激而成厌世的人生观；或者有托而逃，寻较远于政治学的安顿心灵所在，或是竟顺流忘返，成绮语谣话的烂小说生涯。瞿秋白没有顺流忘返，却也产生过厌世思想。这是对辛亥革命后现实生活失望的反映。鲁迅也说过：“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②所以辛亥革命以后的几年，他很少活动，除在教育部上班，就是在北京的绍兴会馆整理古籍，抄写碑帖，实际上是由于失望和对现实不满而陷入沉思。瞿秋白也是类似情况，不过他是思虑“大千世界生命的疑问”。

瞿秋白对“民国”的现实极为不满，特别是在他中学未毕业，不得不到社会上谋生(到无锡乡村教书)时，“更发见了无量无数的‘?’”。“人生的意义”，“人与人的关系”和各种社会问题，经常在他心灵上纠缠着。1917年他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想将来从东西文化交流探讨改变中国现状的出路。但北京城里新官僚“民国”的种种丑恶现象，又使他受一重大刺激。所以他曾有过“避世观”、“厌世观”，一度心情是很灰暗的。然而现状又总是触动他对社会的疑问，使他的心灵不能平静。他博览群书，研究各种学问，希望能从中找到人生的道路。他研究过佛学和国学，想从佛学“试解人生问题”，从研究和整理国故“做救中国的功夫”。他爱好文学，又

^① 《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一)，第13页。

^② 《自选集·自序》，《鲁迅选集》第4卷，第455页。

深究哲学，文学使他“笑怒哀乐未厌”，哲学使他思辨“内的要求”，发展个性；岳飞、文天祥的诗词曾激发他的爱国热情，老庄思想又使他向往平静和谐；他受到“家族旧思想”的培植，而“新时代的自由神”又移其心性；康德、狄德罗、卢梭、歌德、托尔斯泰都曾给他以影响，陈独秀请来的“德赛二先生”也使他感到“津津有味”。他痛恨旧社会的不合理状况，希望改变“人与人的关系”。他为解决人生问题、社会问题、国家问题，就像一个苦行僧那样刻苦探求，冥思苦索：“满天痛苦谁念，倒悬待解何年？”他说，在北京三年，“是我最枯寂的生涯”。因为他看到了中国社会无量无数的“？”，却未找到解决的办法和出路。

在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中，一般都经历过由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思想转变。在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尽管思想倾向有所不同，有的注重哲学伦理，有的开始变革文学戏剧，有的倾向无政府主义或乌托邦，搞“互助”组织或新村试验，但他们都信仰或追求过革命的民主主义，并在行动上参加了一定的斗争。

瞿秋白有自己的特点。他也受到民主主义的影响，发现许多社会问题，“有变的要求”，并产生过“社会问题的政治解决”的想法，但他更侧重哲理的探求。他在北京的三年，正是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许多青年卷入这一“新旧思想之激战”，并且也曾震动他的“心灵”，而实际生活却又使他“觉得人生孤寂的很”。他说：这“说明我当时孤独生活中的‘二元论的人生观’。一部分生活经营我‘世间的’责任，为自己生计的准备；一部分的生活努力于‘出世间’的功德，做文化救中国的功夫。我的进俄文专修馆，而同时哲学研究不辍，一天工作十一小时以上的刻苦生涯，就是这种人生观的表现。”所以，比较起来，在早期，瞿秋白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是显得淡薄些。

五四运动是瞿秋白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个伟大

的爱国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把他从“枯寂生涯”卷入斗争旋涡，使他久经压抑的心灵火苗在反帝反封建的熊熊烈火中燃烧起来。他和当时的许多进步青年一样，“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参加学生运动”。他们处于社会生活之中，只知道社会中无名毒症，却不知道怎样医治，单由自己的体验，那不安的感觉再也藏不住了，有“变”的要求，就突然爆发，先与社会以震惊的刺激。同时，辛亥后八九年中国社会现象的反动，《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所表现的思想变动，趁着学生运动中社会心理的倾向，起翻天的巨浪，摇荡全中国。就是在这个“翻天巨浪”中，瞿秋白表现了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然而也就在这时或稍后，他又开始倾向社会主义。

这不是偶然的。瞿秋白以他的亲身感受说明了这个变化的内在原因：“当时爱国运动的意义，绝不能望文生义的去解释他。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天才感受殖民地化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原因。况且家族农业经济破产，旧社会组织失去了他的根据地，于是社会问题更复杂了。从孔教问题，妇女问题一直到劳动问题，社会改造问题，从文字上的文学问题一直到人生观的哲学问题，都在这一时期兴起，萦绕着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想。”^①他自己的思想也是由此变化的。

瞿秋白积极参加了学生运动。他作为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的学生代表，不仅自己参加示威游行，还组织同学参加运动，并同校内外朋友经常一起讨论问题。在“六三”时，他和同学们上街进行

① 《瞿秋白文集》（一）第23页。

爱国讲演，被反动政府逮捕，但他毫不畏缩，鼓励同学们继续坚持斗争。

五四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因此，紧接着政治斗争的高潮便是思想讨论的深入，在广大青年中掀起了学习新思想和讨论社会改造问题的热潮。在当时思想界非常活跃，各种思想纷至沓来。所谓新思想新文化，有民主主义，有社会主义，也有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思想如实用主义、柏格森主义等。就是社会主义思想中也是泥沙俱下，除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外，还有空想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等。各种思想互相冲突，互相激荡，人们往往受多种思想的影响。但是，先进分子经过学习和实践比较，很快认识到，他们所要接受并为之奋斗的新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新文化，才能彻底反帝反封建。

瞿秋白在五四运动中受到很大教育和鼓舞，他清楚认识了中国的社会问题，加深了他要求从根本上改造社会的“兜底翻”的革命思想。1919年11月，他和郑振铎、耿济之、瞿菊农等创办刊物，猛烈抨击旧社会和各种旧思想，讨论社会主义和社会改造问题。他说：“我和菊农、振铎、济之等同志组织《新社会》旬刊，于是我的思想第一次与社会生活接触。而且学生运动中所受的一番社会的教训，使我更明白‘社会’的意义。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①当然，他们的讨论还是模糊的，犹如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的意义，都还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当时的思想界就象久壅的闸门，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其出流的方向。其实一般的社会思潮大多是如此。但就是在这些讨论中，他开始倾向马克思主

① 《瞿秋白文集》（一），第23页。

义。

瞿秋白在《新社会》上发表的文章，主要是研究和宣传劳动问题、社会运动和社会主义。他揭露旧社会的种种罪恶，攻击统治阶级，主张根本改造中国社会。他说：中国人“要是想生存在世界上，那就不能不赶快觉悟——真正的觉悟——去改造现在的社会，重建现在的国家。”^①“我们想改良社会，最好是要能做到根本改造社会一切组织。”要“改革社会，非创造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改革旧制度，打破旧习惯不可。”^②他深切同情劳动人民，指出“劳动界的不平，完全是资本家的专横压迫出来的，资本家要行经济侵略主义，所以要用劳动者来做他的机械。”又说：“农业国的中国，几千万农人受着军阀财阀直接间接的强暴侵略。……我们农人三年水四年旱，一天够两天短，寅年吃着卯年粮，地主贷块钱却巢出五担米。”^③他鼓励工人农民联合起来，用“阶级斗争的利器”进行反抗斗争。他不赞成青年自杀，认为有为的青年应该努力学习，提高觉悟，“细心观察社会的病源”，要有“热烈的感情”，也有“沉静的研究”，要从这旧宗教旧制度旧思想的旧社会找到一条出路，在这暮气沉沉的世界里放出光来。在《读〈美利坚宗教新村运动〉》一文中，瞿秋白分析了新村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思想“不是社会主义的”，并将马克思主义和空想的新村主义作比较，明确表示赞成马克思主义：“我以为历史派的——马克思主义派的直接运动是不可少的。……我想这或者是较普遍的、较易进步的办法，不至于像办新村办不好，仅仅是新式理想的‘桃园’。”他相信社会主义必将在全世界胜利，他说：“胜负虽然一时分不出来，这种趋势是很明瞭的——世界的进步着着

① 《欧洲大战与国民自解》，《新社会》第1号。

② 《社会运动的牺牲者》，《新社会》第8号。

③ 《中国的劳动问题，世界的劳动问题》，《谁的利器》，《新社会》第4、第17期。

向着社会主义发展，一步失败就有一步成功，终究可以希望全世界的大改革。”他在《伯伯尔的泛劳动主义观》一文中，表示赞成倍倍尔“主张建设新社会——将来的社会，主张激烈的改革运动——革命，根本的改造”的观点，赞成“劳农革命”，用革命手段来“消灭资产阶级底垄断尊严”。在这不久，他参加了李大钊同志等发起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当然，瞿秋白当时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认识还不是清楚的。可是他也用形象的语言作了说明：“中国的社会生活，好象朦胧晓梦，模糊得很。人人只知道‘时乖命蹇’，哪知生活的帐子里有巨大的毒虫以至于蚊蚋，争相吸取他们的精血呢？大千世界生命的疑问不必提起。各人吃饭问题的背后，都有世界经济现象映着，——好象一巨大的魔鬼尽在他们所加上去的正数旁边画负号呢。”这些吸吮中国人民精血的毒虫、在中国头上画负号的魔鬼，不正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吗？正是它们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使中国贫穷落后，社会问题丛生，连吃饭都成了大问题。瞿秋白赞成“根本改造”、“激烈的改革运动——革命”，就是要深入一层，把这些毒虫、蚊蚋、魔鬼根除。

在当时，瞿秋白已开始翻译俄国文学，研究苏俄的新文学家。1920年3月，他在《〈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中说：“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在中国却已似极一时之盛。何以故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一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响。大家追溯他的近因，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中于俄国……；而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都想在生活的状况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要来讨论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俄国旧社会崩溃的声浪，惊醒了正在寻找

出路的中国先进分子。瞿秋白的言论，反映了先进分子根据俄国革命经验重新考虑中国问题的倾向。

1920年9月，瞿秋白应北京《晨报》的邀请，决定以特约通讯员名义去苏俄。他去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借此机会考察俄国十月革命和革命后的实际情况，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人民开辟一条光明的路。他在《饿乡纪程》中曾多次说明了这样的心情：

“阴沉沉，黑黢黢的天地间，忽然放出一线微细的光明来了。……兄弟们，预备着。倘若你们不因为久处黑暗，怕他眩眼，我去拨开重障，放他进来。……我决不忘记你们，我总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

“我有能力，还要求发展，四周的环境既然如此，我再追追想想他的缘故，这问题真太复杂了。我要求改变环境，去发展个性，求一个‘中国问题’的相当解决，——略尽一份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

“我呢？以整理思想方法入手，……当时已经略略领会得唯实的人生观及宇宙观。我成就了我世间的‘唯物主义’。决然想探一探险，求实际的结论，在某一范围内的真实知识，……我入俄的志愿——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

我们看到，这是一颗多么热烈跳动的心呵！

从十月革命以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就对布尔什维克和劳农政府极尽歪曲宣传之能事，诬蔑它是“洪水猛兽的过激派”。另一方面，经过四年欧战和三年内战的破坏，新的苏维埃政权也确实遇到极大的困难，这也使人们弄不清真相。但是，瞿秋白不管这些，他毅然决然到“饿乡”寻找真理。他在告别朋友时说：“我现在有了我的饿乡了——苏维埃俄国。俄国怎样没有吃，没有穿，饥，寒，暂且不管，他始终是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东西文化的接触地。”在送别时，其叔瞿菊农以诗相赠，

“要做蜜蜂儿，采花酿蜜。不要做邮差，只来回送两封信儿。”秋白也以诗作答：“若说是——采花酿蜜：蜂蜜成时百花谢，再回头，灿烂云华。”

瞿秋白以满腔的热忱奔向列宁的国家。“启程了，启程了！向着红光里去！”“快到目的地了！苏维埃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马克思经济学的社会主义，可以有研究的机会了！”在路上，他和同行的俞颂华作了分工，由俞负通信事务的责任，而他则决定了“有系统的理论、事实双方研究的目的。研究共产主义，研究俄国共产党，俄罗斯文化。”他把共产主义比作“心海中的灯塔”，并且勉励自己：“灯塔已见，海道虽不平静，拨准船舵，前进！前进！”

在瞿秋白到苏俄时，为了向俄国工人表示敬意，同时说明他们来俄是为了向中国正确报导苏俄的情况，以便“给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以一个推动”，他写了一篇《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刊登在1921年2月27日出版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公报》上。他说：“中国陷在落后的黑暗境遇中。中国无产阶级只希望于你们，勇敢的俄国工人，你们为全人类的幸福而英勇奋斗，你们建立了苏俄社会主义共和国，你们正在实现着社会主义原则，与黑暗势力进行斗争，克服着无数困难，你们忍受着百般困苦而始终不丧失信心。中国无产阶级极为钦佩你们，衷心地祝愿你们获得成功和胜利。”

瞿秋白着重向苏俄人民介绍了中国情况和工人状况，指出中国真实的政治情况是，野蛮的军阀和卑鄙的官僚统治着我们的人民。他们根本不关心人民的福利，仅仅只考虑自己的私利。在中国，由于军阀官僚的压迫，不仅中国无产阶级遭受苦难，甚至知识分子也经历着难以言状的痛苦。“中国工人遭受着与欧美工人同样的压迫，或者甚至更厉害，因为他们所受的压迫不仅来自中国资本家，而且来自外国资本家。”中国无产阶级非常痛苦，可是

还没有组织起来。“如果我们希望使中国的无产阶级加入世界运动，我们就应当接近他们，传授给他们知识，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我们诚恳地希望承担起这一责任。”

在苏俄的两年中，瞿秋白进行了大量工作和活动。他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研究社会科学、文艺理论和文学作品；他访问工厂、农村、苏维埃机关、文化团体等；他担任东方劳动大学的翻译和助教，并出席远东劳动者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多次见到伟大导师列宁，对列宁表示了崇高的敬意。如在共产国际三大上，“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德法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演说时绝没有大学教授的态度，而一种诚挚果毅的政治家态度流露于自然之中。有一次在廊上相遇略谈几句，他指给我几篇东方问题的材料”。这也反映了列宁对东方问题的极大关注。又如在一次工厂的集会上，“工人群众的眼光，万箭一心，都注射在列宁身上。大家用心尽力听着演说，一字不肯放过。列宁说时，用极明显的比喻，证明苏维埃政府为劳动者自己的政府，在劳动群众之心中，这层意思一天比一天增胜，一天比一天明瞭：‘拿着军器的人’，向来是劳动群众心目中一可怕的东西；现在不但不觉他——赤军——可怕，而且还是自己的保护者。”^①

通过学习研究和实际工作，瞿秋白对马列主义和俄国革命有了较深的了解，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 worldview。他认识到：“一切真理，从物质的经济生活到心灵的精神生活，都密切依靠于实际。”“抽象的‘真、美、善’的社会理想，决不能象飞将军似的从天而降。……劳工神圣，理想的天国，不在于知识阶级的笔下，而在于劳工阶级实际生活上的精进。”因此使他“更确定我的‘世间的唯物主义’”。瞿秋白过去很强调“内的要求”，个性发展，年轻时由于个性受到环境的束缚压抑，他的思想曾是灰暗

^① 《赤都心史》，《瞿秋白文集》（一），第128、159页。

的。他去苏俄时也说过“要求改变环境发展个性”。然而两年的实际观察体会，他认识到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求得社会的解放，才有个性解放。只有置身于人民群众之中，为人民服务，才能摆脱孤寂苦恼，获得前进的力量。他说：“主观的我在客观的物之中，何容你呖语连篇的求解放呢。”“梦幻！梦幻！离社会求个性，个性在什么地方呢！”又说：“‘为人服务’，忘了这‘我’，‘我’却安逸，念念着‘我’，‘我’反受苦。”“秋白的‘我’，不是旧时代的孝子贤孙，而是新时代的活泼稚儿。”我自是小卒，“然而始终是积极的奋斗者”。^①瞿秋白从现实生活中找到了伟大的革命力量，决心为人民服务，作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就在这时，他由张太雷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②

在旅俄期间，瞿秋白曾肺病发作，住医院疗养，但仍写了一系列作品。《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是颇具哲理的散文作品，记述了他决定去苏俄、一路到苏俄和在苏俄期间的思想感情，心程中的变迁起伏，读书心得，冥想感会等，是他心理记录的底稿，反映了一个东方进步青年在赤俄的成长。他还写了从理论上探讨俄国革命的《俄罗斯革命论》以及《俄国文学史》。此外，并写了大量通讯报道，从1921年6月到1922年11月，连续发表在北京《晨报》上的有三十五篇达十六万字之多（邮寄中还遗失许多篇）。其中包括《共产主义之人间化》、《苏维埃俄罗斯之经济问题》、《苏俄经济改造之新气象》、《苏俄政府内政外交之新局面》、《赤俄之第四年》等等，对苏俄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党的建设、农民问题、民族问题等作了系统的报道，并介绍了列宁的一些讲话。这是中国人根据直接考察访问第一次向全国人民所作的关于苏俄各

① 均见《饿乡纪程》，《赤都心史》。

② 瞿秋白的入党时间，过去一般认为是1922年2月。但据《多余的话》附录“记忆中的日期”说：1921年“五月，张太雷介绍入共产党”。

方面情况的全面报告，有力地驳斥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恶意宣传，澄清了人们的误解，使人们认识到劳农国家人民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生活，从而得到鼓舞，引起向往。郑振铎回忆说：“那些充满了热情和同情的报道，令无限的读者们对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无限的向往心情。我相信，那影响是很大的。”^①

瞿秋白作为一个初具无产阶级立场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新闻记者，在他的报道中并没有回避俄国革命所遭遇到的困难和经济上的破坏，而是作了真实的报道，但他更指出了在这些困难和穷窘的后面发生着一个多么深刻剧烈的变动，这个变动本身具有摧毁一切旧的和建设新的美好幸福生活的强大力量。作者记载了旧的反动没落势力的垂死挣扎，但他进一步指出：这些旧的势力已经走上无可挽回的灭亡的道路，而新生的革命力量却显得那么可爱，不可战胜。他已开始用阶级观点分析问题，因而对问题的看法就愈加深刻。他说：“欧战四年内乱三年的俄罗斯，实在经过了不少惊天动地的变更，古今未有的困苦，俄国的劳动人民千辛万苦支撑下来。”^②“苏维埃政府，十月革命，步步证实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说。革命的伟力各方面的发展，几十次困苦的战斗，全赖于两革命阶级——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在十月革命时这两阶级结合一巩固的协约，消灭帝国主义的战争，收得大工业与土地。负巨大的牺牲，在斗争过程中竭尽全力以向共同之敌，警策戒严，强弩满挽。”^③他正确地看待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认为在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事业中，这是不可避免的。他在《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的长篇通讯中说：“共产主义是‘理想’，实行共产主义的是‘人’，是

① 《记瞿秋白早年的二三事》，《新观察》1955年第12期。

② 《赤俄之归途》，《瞿秋白文集》（一），第200页。

③ 《赤俄之第四年》，《晨报》1922年8月16日。

‘人间的’。他们所以不免有流弊，也是自然不可免的现象。”“哪能一跳便入天堂。”重要的是“共产主义从此不能仍旧是社会主义丛书里一个目录了”，它已经开始在人间实行起来，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因此，瞿秋白认为：“这一层中国人应用一用心，俄国革命史是一部很好的参考书呵！”

经过两年的考察和锻炼，瞿秋白已经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了。

二、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

瞿秋白1923年1月回国。当时帝国主义正在中国进行激烈争夺，以此为背景，各派军阀连年混战不息，肆意残害人民，帝国主义的军舰军警也到处横行。在统治阶级中，什么“最高问题”（即总统问题）、阁员问题、制宪问题等，丑闻百出；唯有最低问题，即人民的最低生活乃至生命问题不值一顾。瞿秋白本急急想把在俄研究所得与国人一谈，不料到北京三天，所接触到的中国现实使他“受异常刺激”，便立即写了《最低问题》一文，说明他回来后见到的是“狗彘食人的中国”，谴责“中国政府原来是‘率兽食人’的政府”。他呼吁平民群众、爱国学生、有志青年速醒，为保住人民的吃饭权生存权，而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和军阀统治的勇猛斗争。

瞿秋白回国不久即参加党中央机关工作。他参加筹备党的“三大”，准备党纲草案，筹组上海大学和党的理论刊物，参与国共合作和国民党改组的商谈，尤其是党的理论宣传等，做了许多工作。

著名革命刊物《新青年》，从1922年7月出完九卷六期即未再出。党中央决定把它改组为党的理论刊物，由瞿秋白主编。经过

瞿秋白的努力,《新青年》季刊第一期“共产国际号”于1923年6月出版,^①并发表了《新青年之新宣言》,公开宣布它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②另外,他还先后担任党刊《前锋》、《向导》的编辑。他在《新青年》上的文章主要是理论方面的,在《向导》上的侧重政治评论,《前锋》上有几篇是探讨社会经济问题。他从回国到五卅运动发表的论文和专著上百篇,涉及问题很广,而主要是宣传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指导革命斗争。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它给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以争取解放的最锐利武器。瞿秋白一方面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如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列宁殖民地民族革命思想,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并翻译介绍马列的著作、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概论》等;另一方面,他更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他一再指出:“革命的理论永远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应用革命理论于革命实践,”“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不可一日或缓”。^③他认为,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实际,就要观察中国社会的发展,政治上的统治阶级,经济状况中的资本主义趋势,以确立中国革命的策略和政策,“作无产阶级的思想指导”。瞿秋白的论著是中国马克思主义

① 《新青年》季刊出四期,1925年4月又改为月刊,但未能按期出版,实际上成为不定期刊,至1926年7月共出五期,即停刊。

② 这篇宣言未署名,从当时情况看,作者可能是陈独秀或瞿秋白。但从几方面考察,只能是瞿,而不是陈:一、本期从封面书写魏体刊头、设计“革命党自狱中庆祝革命之声”图案,译《国际歌》,作《赤潮曲》,到编辑校对,均瞿所为,全部论文为瞿所写;陈仅一篇译稿,他当时主要力量在《向导》和准备“三大”。二、宣言开头以歌德的诗为引,这在瞿文中常有,在陈文中则未见。三、宣言中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此思想在瞿文中有,陈当时恰无。

③ 《瞿秋白论文集》自序,《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2期。